

北京地区碑刻中的旗人史料

刘小萌

在现存清代北京地区石刻中，旗人石刻占有很大比例。旗人石刻类型多样，主要有刻石、摩崖、碑碣、墓志等，内容涉及八旗制度乃至满汉旗民的诸多方面，且所详者又往往可补文献史书之阙，研究价值之高不言而喻。目前围绕旗人碑刻展开的研究还刚刚起步，笔者试结合近时的研究心得，就旗人碑刻的整理情况以及它的特点和价值作一概括的说明，以期推动这方面的研究。

一、旗人碑刻的整理情况

清代是等级制度高度发达的社会，对皇室和品官用碑，在规格、形制、题字等方面，都有严格的规定。旗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，在国家的政治、军事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尤其在开国时代，文则运筹帷幄，武则叱咤骑射，群英崛起，盛极一时。由此形成众多旗人碑刻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旗人碑刻除散见于东北等一些地方外，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。自顺治元年（1644）清廷入关定鼎北京，满洲皇室和八旗将士就世代居住在这里，围绕他们的历史足迹，留下了形形色色的碑刻。这些碑刻，为研究清史、满族史以及八旗制度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。

关于清代北京碑刻，前人已作了大量搜集整理工作。清人钱

仪吉（1783—1850）编纂《碑传集》，采辑清朝自天命纪元至嘉庆朝约200年间碑版状记之文，旁及地志杂传等，分宗室、功臣、宰辅、部院大臣、内阁九卿、翰詹、科道、曹司、督抚、河臣、监司、守令、孝官、佐贰杂职、武臣、忠节、逸民、理学、经学、文学、孝友、义行、方术、藩臣、烈女等二十五目，凡一百六十卷，包括2000余人的历史资料。其中，旗人史料占有很大比重。

清朝宗室盛昱留心旗人文献，同表弟杨钟羲编纂《八旗文经》，堪称有清一代旗人文献的典籍。书中卷四十二至四十四“碑”、卷四十七至四十八“墓碑”、卷四十九墓志，收有若干反映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的原始资料。

盛昱字伯熙，清初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，隶镶白旗满洲。光绪二年（1867）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后迁翰林院侍读。讨论经史、輿地及本朝掌故，皆能详其沿革。其间数上奏章，弹劾大员，以“清流”自诩。光绪十年任国子监祭酒，因政治上受到排挤，将精力投注于考据学问。他崇尚风雅，精通金石，对旗人碑刻情有独钟，“时出游衍蜡屐访碑，复广觅拓工，裹粮四出，近畿之碑响拓殆遍。”^①多年搜集，集腋成裘，蔚为大观。盛昱既歿，原拓散亡，惟副本尚存，惜当初顾觅抄手誊录副本时，前后多有错乱，未及编次，于是经杨钟羲对副本加以编次，因无原拓可校，整理后的本子仍不免缺讹。杨氏以往岁盛昱赠词中有“年年雪屐寻碑”一语，定书名曰《雪屐寻碑录》。

《碑录》整理后印行未果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闻讯辗转寻访，将书稿携归东瀛，然未及印行而身歿。及30年代金毓黻编纂《辽海丛书》，始由日本友人处借得书稿，编入第五辑印行。《雪屐寻碑录》凡十六卷八百八十篇，基本是北京旗人碑刻，属于汉人者寥寥数篇而已。收录范围以帝诏御制谕祭文为最多；又有家撰墓碑、明堂碑文及祠堂记等。

前人搜集金石碑刻，一向贵远而贱近，每得一唐刻宋拓，无

不互相矜重，而不必文章名贵，书法精美，概因物以稀为贵。而盛昱搜集碑刻遗文，及于当世，确实是需要一些远见卓识的。至于是书之价值，诚如金毓黻先生所指出的：“其粲然可睹者多为典章文物之所存，盛衰荣悴之所系，谓为《文经》之亚，谁曰不宜？即其姓氏爵里宗支子姓之琐细者，亦多为公私记载所不及详，异日续辑通志、通谱诸书，蒐求八旗掌故，自必以是书为渔猎采伐之资。”^②

盛昱等以个人之力，自然难以将京畿一带旗人碑刻搜访殆尽，自清末民初以来，一些机构和个人继续这方面的工作。民国时《房山县志》、《良乡县志》，溥儒编《白带山志》等，都收有一些相关资料。这类资料也逐渐为各图书馆、博物馆所网罗。其中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石刻拓本数量最多，特别是在50年代，国家图书馆与有关单位合作，对北京地区的石刻进行了大规模传拓，使许多旗人碑刻得以保存，大大丰富了自盛昱以来的收藏。

1990年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，其中清代部分30册，收拓本5000余种。该书收录旗人碑刻，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《雪履寻碑录》，而且在范围上也较前书广泛，除了帝诏御制谕祭文、家撰墓碑、明堂碑文、祠堂记等之外，还包括题名、经刻、手书等等，对于研究清代北京旗人首先是满洲旗人的社会生活、军事和政治制度、氏族谱系、民族关系、文化变迁、宗教信仰等，都有重要价值。

因《汇编》对单一民族文字的碑文未全部收录，所以要了解国家图书馆满文石刻的准确情况，还必须参考《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》^③。该书《石刻拓片部分》，列有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693件满文碑刻目录，附有碑名（一般为满汉文对照）、碑额、碑文文种（如单一满文或满汉文）、撰者、立碑时间、地点以及目前的收藏单位的说明，检索颇便。

徐自强主编《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》，也是了解北

京地区碑刻收藏情况的必要参考^④。全书所收石刻 6340 种，以清代石刻最多，有 3540 种，主要有墓碑（包括墓表、谕祭碑、神道碑、先茔碑、墓碣）、墓志（包括生圻志）、庙宇碑（包括观、庵、祠堂、善会碑及修缮寺庙之捐资题名等碑）、题名和题字碑（包括榜书和帝王御笔诗文）、杂刻（包括感恩、功德、家祠、学校等碑），涉及旗人生活方方面面。

二、旗人碑刻的文字特色与价值

清代旗人碑刻文字，分为单一满文、满汉合璧、满蒙汉合璧、满蒙汉藏合璧、单一汉文等几种形式。在清代 200 多年里，满文又称清文，尊为“国书”，但就碑刻而言，还是满汉合璧者为多，这也是有清一代八旗行文的标准格式。近代以来，纯用汉文的碑刻逐渐增加。至于纯用满文的早期碑刻，存世者几稀，就目前所知，只有两通。一为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《索尼先茔碑》，拓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^⑤，另一为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江宁将军额楚诰封碑，现藏北京石刻博物馆。后者尚未公开展览，故鲜为人知，《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》亦未收录。该碑在研究额楚身世、以及满文碑刻形制方面，都有重要价值。

满汉合璧碑刻虽内容大体重合，也有它独到的价值：

第一、拾遗补缺。有些满汉合璧碑刻，某一文字部分早已湮没模糊，难以辨识，另一文字部分则相对清晰，在这种场合，通过相对清晰部分可以完整地了解碑文内容。

还有些碑刻，满文部分与汉文部分内容上有出入，可以相互发明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三月刻《王法哈墓碑》，汉文部分为：“顺治岁次乙未季春吉旦诰赠通义大夫法哈王公之墓”，满文部分为：“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 ci aniya ilan biyai sain inenggi gūwalgiya halai sargan ilibuha. g'oming bume amcame fungnehe doro de hūsun buhe amban faha i eifu”^⑥。满文部分提到，该碑为

法哈之妻瓜尔佳氏所立，为汉文部分所无；汉文部分谓法哈的汉姓为“王”，而满文部分略而不言。综合满汉两部分文字，不仅确认王法哈为满人，还说明满人于入关初已习惯冠汉姓。

第二，诠释词义。碑刻汉文部分通常辞藻华丽，套语连篇，满文部分则相对朴实简洁。阅读满文部分，易于准确把握碑文原义。清初文献中屡有“黑白昂邦”一职，其意颇不可解，对应满汉合璧碑文，知“黑白昂邦”即满语“hebei amban”的音译，后译“议政大臣”，即有资格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大臣。

第三，考察语汇演变。满族入关后，深受汉文化影响，语汇更新的速度很快，容量也在不断扩大。以往研究满语词汇的演变，主要依据清代编撰的满文辞书、文书档案，而满文碑刻作为民间语言的活化石，准确无误地保留了不同时期满语语汇的构成与特点，为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研究满语满文，开辟了新的途径。

关于满语与汉语的关系，有研究者指出：清初旗人中流行的汉语原是辽东语（沈阳语），明末辽东汉人大批编入八旗，以后随着满人进入北京，又将辽东语带入北京。辽东汉语因受到女真语（满语）的影响，失去了“失”、“吃”、“直”、“日”等音，而变成“斯”、“此”、“兹”、“依”。^②印证顺、康年间碑刻，“中原”一词，顺治八年八月《和格诰封碑》的满文写为：“dzong yuwan”（音“宗原”）；顺治十二年十月《赐汤若望茔地谕旨碑》中园头王九重的“重”字，满文写为：“dzong”（音“宗”）。就是入关初期满语中汉语借词带有辽东语特点的两个具体例子。

三、旗人碑刻的研究价值

日本学者鸳渊一曾著《满洲碑记考》，开创了利用碑刻史料研究满族史和清朝史的先河，但关于北京一带的旗人碑刻，迄今还没有系统的研究。以笔者的初步了解，旗人碑刻史料，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研究价值：

1. 八旗人物

旗人碑刻，以诰封碑、墓志为主，集中反映贵族、官员的身世与政绩。

宗室王公碑刻数量很多，重要的有顺治八年肃亲王和格（豪格）诰封碑、十四年多罗贝勒杜尔户墓碑，康熙元年惠顺亲王祜塞墓碑、五年多罗贝勒常阿岱墓碑、六年辅国公构孳墓碑、十年镇国公果色墓碑、十一年礼亲王代善墓碑、豫郡王多铎墓碑、承泽亲王硕塞墓碑、十四年显亲王富寿墓碑、三十九年康亲王杰书墓碑、四十二年简亲王雅布墓碑、四十九年康亲王椿泰墓碑，雍正九年怡亲王胤祥庙碑、十年怡亲王胤祥祠碑、十一年贤良祠碑、十二年贤良寺碑，乾隆三年诚郡王允祉墓碑、八年庄亲王允禄世子弘普墓碑、十七年定亲王永璜墓碑、简亲王德沛墓碑、二十八年信郡王德昭墓碑、三十二年庄亲王允禄墓碑、纯亲王永祺墓碑、三十五年恭亲王弘昼墓碑、三十七年显亲王衍璜墓碑、三十九年诚亲王允秘墓碑、四十三年奠代善墓诗刻、肃亲王成信墓碑、四十四年弘曠墓碑、六十年诚郡王弘畅墓碑，嘉庆七年多罗贝勒绵惠谕祭碑，道光二年定亲王绵恩墓碑、四年顺承郡王伦柱墓碑、二十一年惇亲王绵恺墓碑、豫亲王裕全墓碑、成亲王永理墓碑，咸丰元年瑞郡王奕志墓碑、四年肃亲王敬敏墓碑，同治七年醇亲王府园寝诗刻碑，光绪五年肃亲王华丰墓碑、十八年醇亲王奕譞墓碑、二十四年恭亲王奕訢墓碑、豫亲王本格墓碑、三十四年肃亲王隆勲墓碑，以及民国六年庆亲王奕劻墓碑等。这些碑文，在研究宗室王公历史时，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有些碑文，虽也收入《实录》等官书，但撰修者基于种种考虑，对碑文加以修改或剪裁。对照碑刻原文，有助于恢复历史原貌。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（碑文称“和格”、“合格”），为争夺皇位与睿亲王多尔衮深相结怨，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被摄政的多尔衮以微末罪名幽系，不久卒于狱。顺治八年福临亲政后，为豪格

昭雪，复王爵，立碑表彰。《世祖实录》卷五九录其碑文有云：“值睿王专政启衅，遽加以罪名，辄行拘系，抑勒致死。”核对碑刻原文则为：“值墨儿根王（即睿王）专政，诬捏事端而拘禁之，遂而自终。”^⑧明确记载豪格是自尽而死的，《实录》却代之模棱两可的说法。顺治十五年九月，福临再次为豪格立碑。^⑨这些记载，对了解皇室骨肉相残的遗案是有裨益的。

多罗恭惠郡王稜德弘（即勒克德浑），和硕礼亲王代善孙、颖亲王萨哈廉次子，生前以功封多罗顺承郡王。《八旗通志》初集卷一二九载：勒克德浑顺治九年（1652）三月薨，年三十四，“康熙十年五月，追谥曰恭惠，勒石记其功焉”。而据《多罗恭惠郡王碑文》^⑩，追谥并勒石记功的时间当在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十月。说明《八旗通志》所记时间有误。

有些诰封碑，于碑主履历缕述颇详，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。觉罗巴哈纳，满洲镶白旗人，景祖觉常安第三兄之四世孙。年十七，效力行间，屡著劳绩。天聪八年（1634）授牛录章京世职。顺治元年（1644）任本旗蒙古、满洲固山额真。是入关时清军的重要将领。顺治末年仕至秘书院大学士。康熙五年（1666）卒，赠谥敏壮。^⑪巴哈纳虽载入《八旗通志》的名臣列传，但篇幅较短，而原立于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满井的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三月《巴哈纳诰封碑》，记载其“初任拜他喇布勒哈番管牛录”直到第十八任“少师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加一级、中和殿大学士”的全部履历，^⑫为了解他的事迹保存了重要史料。类似碑文以顺、康二朝为多。

清朝定鼎中原，国势日隆，开国勋臣的辉煌业绩，都镌刻碑铭，以垂久远。勋臣索尼，为清初政坛上四朝元老，宦绩卓著。关于皇太极死后的继位之争，《索尼诰封碑》记载说：“父皇太宗文皇帝宾天，国势抢攘无主，宗室昆弟，各肆行作乱，争窥大宝，尔重念父皇恩遇，坚持忠贞之心，不惜性命，戮力皇家，同叔和硕

郑亲王扶立朕躬，秉忠义以定国难”，充分肯定了索尼在福临即位问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。又提及多尔袞擅政后对索尼的迫害：“顺治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后，墨勒根王心怀篡夺，知尔必为朕死，实难存留，以计遣祀昭陵，随无故削职，即安置彼处。朕亲政之后，知尔无辜召回。”^⑬索尼之兄噶布喇的女儿嫁给了康熙帝玄烨，即仁孝皇后，因有这层关系，索尼、索额图父子在朝廷中权势熏灼，益发不可一世。与索尼家族有关的碑刻还有《索尼墓碑》、《众圣保（索尼孙女）圻志》、《噶布喇墓碑》。^⑭

墓志，又称墓志铭，是埋入墓中记载墓主姓名家世和生平业绩的标识物。范文程、洪承畴、马鸣佩等人，都是清初汉军显赫人物，他们的墓志、祠堂碑，提供了关于家世、政绩、婚姻、子女的详细情况。^⑮

大西农民军首领孙可望，张献忠义子，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八月降清，编入旗籍，封义王。十七年（1660）死。关于其死因，向有病故和被清廷暗害二说。《圣祖实录》卷二顺治十八年四月庚午：“赐故义王孙可望，谥恪顺。”文辞简略。而《谥恪顺义王碑文》载谕旨全文，是研究孙可望的有用资料。^⑯

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巴尔达奇，原籍“京奇里兀喇”（今黑龙江流域精奇里江），索伦部达斡尔人首领。顺治年间率部内迁，编入旗籍。墓碑称他：“倾心内附，岁贡方物，及同党相残，又能率尔兄弟协力纳款。”该碑对研究清初东北边疆民族史有宝贵价值。^⑰宁古塔将军巴海在招抚“新满洲”、巩固东北边防方面建有殊功，玄烨御赐诗有云：“夙简威名将略雄，高牙坐镇海云东。旌麾列处销兵气，壁垒开时壮武功。”有关碑文可与文献记载相得益彰。^⑱

清初旗人建功立业，有武功，也有文治。《顺治九年满洲进士题名碑》，记载了麻勒吉等50名满洲进士的人名、旗籍，其中一甲3人，二甲7人，三甲40人。内容远详于官书。进士哲库纳，碑文记为镶蓝旗人，而《八旗通志·儒林传》记为镶白旗人，似

误。说明题名碑有证史的功用。乾隆四年、十年、十三年、十六年《翻译进士题名碑》，也是研究满洲文士的重要史料。此外，乾隆七年九月、二十年四月、二十九年四月、三十七年十二月、四十一年十月、五十五年十月，嘉庆七年至道光三年、道光四年至十年、十年至十六年、十六年至三十年，咸丰元年至同治十三年，光绪元年至三十二年《满御史题名碑》，为研究八旗御史和监察制度，提供了系统详实的资料。

2. 八旗内外关系

研究八旗组织的学者，会关注到这样几层关系，一层是八旗内部满洲、蒙古、汉军人之间的关系，另一层是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关系。而制约这两层关系的，则是满人与汉人的关系。如何捋顺这几层关系，把握其演变的趋向和脉络，对正确认识清代旗人社会及其内外关系，都是很有意义的。在这方面，旗人碑刻所蕴涵的信息量也是非常丰富的。

八旗组织包括满洲、蒙古、汉军三个部分，原本是多民族成分的结合体，正是由于这个组织的陶熔，才使多民族成分的差异逐渐缩小。内务府和王公府属汉军旗人，是汉军中与满族关系最紧密也最久远的一部分，并因此被附载入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。

尚氏家族，是内府汉军的一个显赫家族，关于该家族，现存有康熙六年（1667）十一月《尚大德（尚兴之父）诰封碑》、《尚兴诰封碑》、《尚志杰墓碑》^⑩。据《八旗通志》初集卷五，尚兴曾管理正白旗满洲包衣第五参领第六旗鼓佐领。《氏族通谱》卷七四：尚大德，正白旗包衣人，世居沈阳地方，国初来归。子尚兴任郎中兼佐领，孙尚志杰原任郎中兼佐领、署内务府总管；尚志舜，原任内务府总管兼佐领。因为地位显赫、世代簪缨，祖坟所在地也得名为“尚家楼”。尚兴作为内务府包衣，在何衙门任郎中，官书所云不明，《尚大德（尚兴之父）诰封碑》提到，他曾任“包依卫勒勒诸尔汉郎中”（booi weilere jurgan i icihiyara hafan，直译为

“〔皇〕家的工部郎中”），应是内务府营造司郎中。

董氏家族，是内府汉军中又一家世。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卷七四董文选传：正黄旗包衣人，世居抚顺地方。其曾孙董得启，原任员外郎；元孙董思，原任銮仪卫銮仪使；董得贵，由佐领定鼎燕京时以功授骑都尉，三遇恩诏，加至二等轻车都尉，卒。其子董殿邦袭职，历任内务府总管，缘事革退。其亲兄之孙穆克登布袭职时削去恩诏所加之职。又董文选四世孙董顺邦、叶清额、董治邦、浩善（墓碑写作董郝善），五世孙三保、董玉麟、石图、八十八、萨哈尔图、董玉象、董色、众神保、增长、常海、禅布、延龄、延福，六世孙八十七、图尔秉阿、葛尔秉阿、朱尔杭阿、清明、七十八、塞克图等人，或跻身官场或博取功名，多非平庸之辈。

董氏祖茔在今北京房山区良乡南坊镇，存世有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十月《董得贵诰封碑》、^{②①}康熙十六年十一月《董得贵及妻舒穆禄氏纳喇氏诰封碑》、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十一月《董郝善及妻郭罗罗氏继配黑摄李氏墓碑》^{②②}、乾隆朝无年月《董殿邦墓表》^{②③}等碑。董得贵，《八旗通志》初集卷二零三有传，曾管理正黄旗包衣第五参领第四旗鼓佐领。^{②④}碑刻中记载了该家族屡受恩诏、世代为官、与满人通婚、取满洲式名等史料。

清初朝鲜人被大批编入内务府，著名的有金氏家族。存世有雍正七年（1729）《金花住神道碑》、《金新达礼神道碑》。^{②⑤}《八旗通志》初集卷四：正黄旗包衣第四参领第二高丽佐领，系国初编立，始以辛达礼（新达礼、新达理）管理。金花柱（花住）是其子。辛达礼，原籍朝鲜易州（碑文写为翼州，即义州）地方，天聪元年（1627）率子弟归附。其子噶布拉、胡住、花住及孙辈、曾孙辈多担任八旗官职。花住子常明仕至领侍卫内大臣、内务府总管，乾隆七年（1742）赐太子太保。^{②⑥}标志着这一家族宠荣臻于顶点。以上两碑皆常明所立，是研究内府朝鲜人的宝贵史料。

研究八旗内外关系，婚姻问题不应忽略。对此，前人已作过一些研究。在旗人墓志和诰封等碑中，保存有一些新的史料。

清朝入关初，在西南地区设“三藩”镇守。“三藩”是指吴三桂、耿仲明、尚可喜。三人都是降清的明将。清廷为笼络之，封吴三桂平西王、耿仲明靖南王、尚可喜平南王，并分别与这三个家族缔结婚姻关系。其中，耿氏家族与皇室有几层婚姻关系。耿仲明死后，子继茂袭爵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，清廷以和硕显亲王姊，赐和硕格格号，妻继茂长子精忠；以固山贝子苏布图女，赐固山格格号，妻其次子昭忠。^②其第三子聚忠，十一岁时，福临命入侍内廷。十五年，又以和硕公主（和硕安亲王女）许配之。诏书中谆谆叮嘱：“尔勿以配和硕公主，为和硕额駙之势，越分悖理，有违正道。”康熙三年（1664）二月又封聚忠妻为柔嘉公主。^③十年，耿继茂病故，长子精忠袭爵。十三年（1674），精忠叛，被诛爵除。而昭忠、聚忠都保持了对清廷的忠诚。^④碑刻还记载了尚可喜子之隆妻和硕和顺公主、^⑤洪承畴孙（即洪士铭子）奕沔聘宗室贵族女等事实。^⑥

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特权地位，曾三令五申，禁止旗民通婚，但清末以来，禁令已形同虚设。满洲大臣端方的两妾杨氏、高氏都是汉人。中下层旗民间的联姻也日愈普遍。^⑦

与旗人婚姻有关的资料还有：乾隆十八年三月《永升妻红氏贞节碣》、二十四年七月《普福妻留嘉氏旌表碑》，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《成都妻库雅拉氏墓碑》，道光十五年五月《成都及妻库雅拉氏墓表》，道光元年三月《岱清阿妻刘氏节烈碑》，道光十一年四月《福格妻康氏贞节碑》，同治八年《伊尔根觉罗室乌苏氏墓碑》，同治十年二月《福德及妻赫特勒氏墓碑》，光绪二十八年九月《德喜妻张氏等殉难碑》，宣统三年五月《长敬侧室魏氏墓碑》等。

3. 旗人宗教活动

清代北京地区流行佛、道等教，寺观庙宇林立，香火甚盛。统治者在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同时，还积极推举佛、道二教。顺治帝福临笃信佛教在历史上是很出名的。京城南海会寺，明嘉靖以来，香火盛极一时。入清，年久寺颓。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众信徒欲重修，命寺僧走江淮，延请禅僧性聪（憨璞）住持是刹。第二年，福临巡狩南苑，于海会寺遇性聪（憨璞），并屡召其入内廷，问佛法大意，奏对称旨，福临大喜，赐“明觉禅师”号。此后，福临对人说：“朕初虽尊崇象教，而未知有宗门耆旧，知有宗门耆旧，则自憨璞始^②。”这是福临接触佛教禅宗之始。性聪住海会寺五年，寺内殿宇廊庑与钟楼山门之属均修葺一新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春，福临还亲自为万安山法海寺慧枢和尚榜书“敬佛”二字^③。同年五月二十一日又谕旨宣徽院发出告示保护法海寺免受搅扰，该告示被刻碑树立于寺旁，碑为满汉文合璧，碑阴刻有法海寺的四至界址^④。这些，都是福临礼佛、敬佛、崇佛的实证。

康熙帝即位后，发内帑重修梵宇，广建佛刹，以致崇佛之风，一时称盛。并给后世留下许多御制碑刻。雍正、乾隆二朝，国家富强，社会安定，最高统治者对于修葺北京地区著名庙宇更是乐此不疲，赏赐大量银两、土地、财物。在统治者的倡导和民人社会风气的涵濡下，众多旗人也是慷慨解囊、乐善好施，将大量钱财、土地施舍给寺院庙观。关于旗人社会生活的这一重要方面，官书和文集中都少有披露，惟独在碑刻中，得到了集中反映。

当时京城内外兴修寺庙，捐资者的成分可以分为几类：一类由满人捐助。一类由满汉旗人捐助。再一类，由旗民合作捐资。

宛平县治之西有义利寺，建于元至正间。其僧智存，精通佛典，于大藏经能记诵其半，人遂以半藏呼之，因称为半藏寺。明代修葺，仅免沦废，及清初岁月愈深，殿宇倾颓。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以辅政大臣索尼倡导，和硕额駙吴应熊、和硕额駙耿聚忠、和硕额駙尚之隆、和硕额駙耿精忠、俺达尚之信、哆罗额駙

耿□忠、大学士范文程、大学士宁完我、内大臣孙延龄、一等金钦尼哈番祖泽洪、吏部左侍郎吴达礼、一等侍卫噶布喇等众多满汉高官共同襄助，大举重修。旧刹面貌焕然一新。索尼念“佛法广大，常能利益众生”，为祈福惠，遂更义利寺名曰保安。^⑤

从康熙中叶起，北京内城修缮庙宇，多由旗、民共同捐资。与此同时，内城中不仅进入了众多民人，而且还出现了“民居”。^⑥越来越多的民人定期或不定期地进入内城，甚至定居下来，对打破旗民畛域，无疑具有积极意义。值得注意的一点：约自道光以降，各种店铺商家越来越频繁地卷入这类社会公益事业，并在碑刻中留下大量记载。这对研究北京内城商业的发展，旗、民关系的演变，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为了组织进香、祭祀、捐修庙宇，或在庙会期间提供各项义务服务，北京的旗民成立了名目繁多的“香会”。这类民间组织打破旗民的界限，形成地域性组织，组织经常性活动，并且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地把活动坚持下去。现存大量会碑、题名碑，为了解香会的活动内容、人员构成提供了详实资料。

4. 旗人土地

旗地问题是以往研究的重点，碑刻史料的挖掘，将为这一传统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崭新天地。

旗人土地就其性质、来源、用途来说，相当复杂。以性质分，有官庄、王庄、一般旗地之别；就来源分，有老圈、价买、典置、长租、赏赐、置换、回赎、转让、继承等之别；就用途分，又有庄田、莹地、祭田等之别。前人研究旗地，主要侧重于官庄、王庄和一般旗地，碑刻则为研究旗人莹地、祭田提供了丰富史料。现存舍地碑、题名碑、善会碑、香火田碑，反映了旗人将大量土地捐献给寺院的现象。值得关注的是：正是在“舍地”的形式下，相当一部分旗地“合法”地流入了民间，而清朝统治者在严禁民人置买旗地的同时，对此种动向却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宽容态度。

另外，清廷虽三令五申禁止民人置买旗地，对宠遇优渥的传教士，却往往另案办理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十月十五日《赐汤若望茔地谕旨碑》，镌刻有福临将阜成门外旗地赏赐汤若望作为茔地的谕旨。清朝入关，圈占京畿一带大片土地作为旗地，安置“从龙入关”的旗人。汤若望作为西洋传教士，却受赐旗地。这虽然只是一个特例，却反映了福临对他的宠信。

雍、乾年间清廷为维护旗人生计，多次大规模清理民典旗地，动帑回赎。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十二月初十日奏：“西洋人郎世宁等，于例禁之后私典旗地，应撤回治罪。”^⑧但在随后的谕旨中，却“加恩免其撤回治罪”，甚至连定例以前所典旗地一概免其回赎。郎世宁奉旨后，深感皇恩浩荡，特镌刻《恩施朗世宁等价典旗地碑》，作为永久纪念。^⑨清廷这样的做法，在当时又是一个特例。郎世宁，意大利米兰人，生于1688年（清康熙二十七年），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底到达北京，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在京逝世，享年78岁。郎世宁历仕康、雍、乾三朝，在绘画方面造诣尤高，留下了一批传世佳作。乾隆十五年查出郎世宁违例典卖旗地时，他在内廷任画师已三十余年。乾隆帝对他如此厚待，自然是基于笼络的目的。不过从另一角度讲，西洋人典买的旗地毕竟寥寥可数，即便对他们网开一面，也丝毫无损于禁止民典旗地的政策。

5. 满族姓名的汉化

满人姓名的汉化，是该民族汉化进程的一个方面。前人研究，主要依据文献中的零散记载。在旗人墓志、寺庙碑、香会题名碑中，关于旗人、首先是满洲旗人的姓名，有原始、完整的记载。而不同时期的记载，又为了解满人姓名的变化过程，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。

满族命名，原有自己的传统与特色，前人对此多有论述，毋庸重复。

清初皇族中取汉名者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顺治帝福临，但因

为实录等官书中皇帝御名为避讳而缺笔，所以“福临”的满文究竟如何书写，无从得知。根据同一时期的碑刻，宗室中镇国公“构孳”(godzi)、“果色”(goose)，似乎也是汉名。^③汉人民间，起名“狗子”的男孩俯拾即是，而“构孳”是否脱胎于“狗子”，尚不敢断言。“果色”又名“高塞”，为清太宗皇太极子，清初著名宗室诗人。肃亲王豪格子则取名富寿(fusheo)，封和硕显亲王。在碑刻中，他们的名字总是满汉对应的，取名的一个共同特点是：汉名在先，满名只是汉名的音译。^④

在康熙年间碑刻中，满人的姓名存在几种情况：

一类为地道满语名字，诸如萨什库、瓦尔大、舒禄、阿思哈、卜达、克什兔、乌尔兔、鄂那海、色勒、都赖、法保、立哥、阿你妈、聂尔兑、厄义兔、八兔、那尔布等皆是。

一类为满族特色汉名，如七十四、四十二、三进保、长寿、存住、常寿、常保、常有、福海、奴才、药师保、花子、老米、关保、三达子、黑达子、六十五、贵禄、老哥、保住儿、丫头、索住、观音保、伽蓝保、二哥、进保、常在、来住等，不一而足。

一类为冠汉姓满名：王花子、刘保住、刘索住、白阿林兔、王白呀喇、赵拉达里、李五十八、赵六十八、鲍六十七、王克什礼、李五十、刘八十、张六十八、王二吉兔、白八十一、程六十儿、马二吉兔、王八十等。^⑤

这些记载说明，满人冠汉姓现象虽然发端于关外时期，而它的普及，可能是在入关后的康熙年间。一般说来，满人取汉姓，与自己的族姓存有一定的对应关系，不过，在碑刻中，还有另外一些有趣的个案。康熙十七年(1678)《安氏莹地碑》载称：满人翁格清，旧以赵为姓，入关后，他为祈祷子孙世世平安，“乃令举族咸以安为氏”。其子遂称安泰。^⑥满人改汉姓的随意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与改姓异曲同工的是，随意命名的例子也摭拾可见。镶黄旗满洲人恒斋，由部外放，辗转至四川成都后生一子，因起名成都。^⑦

就是随意取汉名的一个例子。

尽管许多满洲男子的姓名已趋汉化，毕竟还在某种程度上留有本族特色。相形之下，碑刻中的满洲妇女，采取了更为汉化的表达方式，即无一例外地称作某门某氏，如伊门关氏、那门赵氏、苏门卜氏、穆门赵氏等等。前为夫姓，后为妇姓。如此表述，与民间妇女如出一辙。^④只有觉罗门刘氏、觉罗门王氏、觉罗门纪氏、全门觉罗氏、胡门富氏之类，将旗妇身份显露无遗。^⑤

北京地区碑刻中的旗人史料，内容丰富。以上只是挂一漏万的说明，更加全面深入的考察仍有待来日。

注：

①金毓黻：《雪履寻碑录叙》，载《辽海丛书》第5册，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。

②金毓黻：《雪履寻碑录叙》。

③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。

④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⑤据《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54—255页。

⑥顺治十二年三月《王法哈墓碑》，载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汇编》（下简称《汇编》）第61册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75页。

⑦常瀛生：《北京土话中的满语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27、130、145页。

⑧顺治八年八月《和格诰封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42页。

⑨顺治十五年九月《合格墓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126页。

⑩顺治十二年十月《多罗恭惠郡王碑文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80页。

⑪《八旗通志》初集第160卷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4003—4004页。

⑫顺治十四年三月《巴哈纳诰封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98页。

⑬康熙六年四月《索尼诰封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85页。

⑭康熙七年四月《索尼墓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112页；康熙十

四年四月《众圣保（索尼孙女）圻志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3册，第69页；康熙二十二年《噶布喇墓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4册，第42页。

⑮康熙四年七月《洪承畴墓志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58页。康熙五年正月《马鸣佩墓志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66页。康熙七年五月《范文程墓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115页。乾隆二十二年正月《范公（文程）祠堂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71册，第95页。康熙十年十二月《洪承畴及妻李氏合葬志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182页。

⑯顺治十八年四月《谥恪顺义王碑文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166页。

⑰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65页。

⑱康熙十七年四月《巴海诰封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3册，第117页。《巴海御赐诗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3册，第120页；康熙二十二年九月《巴海及妻艾新觉罗氏诰封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4册，第60页。康熙三十六年四月《巴海谕祭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5册，第102页。

⑲碑在北京朝阳区尚家楼。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100—101页；第67册，第161页。

⑳载《汇编》第63册，第97页。

㉑载《汇编》第66册，第174页。

㉒载《汇编》第76册。

㉓《八旗通志》初集第4卷，第67页。

㉔载《汇编》第68卷，第80—83页。

㉕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第72卷，第790页。参见《汇编》第69册，第183页。

㉖《八旗通志》初集第175卷，第4238页。

㉗顺治十五年五月《耿聚忠诰封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117页。康熙三年二月《耿聚忠妻和硕柔嘉公主诰封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25页。

㉘《八旗通志》初集第188卷，第4466页。

㉙康熙三十一年三月《尚之隆妻和硕和顺公主谕祭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5册，第5页。

㉚康熙二十年三月《洪士铭妻林氏墓志》，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出土。载《汇编》第63册，第153页。

㉛《端方侍姬杨氏高氏墓碣》，光绪二十九年七月。载《汇编》第88册，

第180页。又见《德喜妻张氏殉难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89册，第139页。

③② 顺治十七年七月僧道忞撰：《海会寺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153页。

③③ 即著名的《敬佛榜书碑》，顺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刻，碑在北京海淀区正红旗村香山法海寺，碑额双勾篆书“敕赐法海禅寺”六字，碑阴刻《西天东土历代佛祖之图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144页。

③④ 碑在北京海淀区正红旗村。载《汇编》第61册，第150页。

③⑤ 康熙三年三月索尼撰：《保安禅寺碑记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33页。

③⑥ 康熙二十七年九月《永寿观音庵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4册，第113页。

③⑦ 《清高宗实录》第378卷，第16页。

③⑧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《恩施朗世宁等价典旗地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70册，第138页。

③⑨ 康熙六年五月《构萼墓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90页；康熙十年九月《果色墓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2册，第177页。

④⑩ 康熙十四年四月《富寿墓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3卷，第71页。

④⑪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《东岳庙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5册，第118—120页；康熙三十七年三月《散司攒香会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5册，第121—122页；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十六日《重修三义庙碑记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6册，第17—18页；康熙五十一年八月《东岳庙速报司岳武穆鄂王碑记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6册，第168—170页。

④⑫ 载《汇编》第63册，第122页。

④⑬ 《成都及妻库雅拉氏墓表》，载《汇编》第80册，第69页。

④⑭ 康熙四十一年二月《曹国相创善会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66册，第6页。

④⑮ 乾隆十三年三月《供茶会碑》，载《汇编》第70册，第18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